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主编 许明 马驰

马克思主义与

20世纪中国文艺活动

高歌奋进
(1949—1966)

曹凤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卷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主编 许明 马驰

马克思主义与

20世纪中国文艺活动

高歌奋进 (1949—1966)

曹凤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歌奋进 : 1949 ~ 1966 / 曹凤等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6
(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文艺活动 / 许明, 马驰主编)
ISBN 978 - 7 - 215 - 09734 - 6

I. ①高… II. ①曹…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史 - 1949 ~ 1966 IV. ①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623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68)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37 千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0.00 元

总 序

《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艺活动》从课题设计到全部校对完成交稿,历时5年,涉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上海大学5个学术单位,分别由多位教授主持各卷。现在终于完成并与读者见面了。

20世纪的中国,云谲波诡,历史事件众多。在这万花筒式的历史演变之中,有一道亮丽的目标明确且成就辉煌的主线——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发展,这是与20世纪中国历史事件血脉相连、相融为一的一股清新的文艺主潮,同时又是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百年里,事件迭出,人物诸多,佳作连篇,义薄云天!马克思主义指导人们进行革命活动,改造了中国;同样,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辉煌历程。

文艺本来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有机的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史前人类就开始有初级的文艺活动,宗教活动、物质的劳动活动等构成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文艺的首要的基本作用是宣泄情感,陶冶情操。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劳动者唱的原始歌曲和跳的原始舞蹈所要表达的,无非就是非功利的情感生活。但是“传统性”“非功利性”并不是文艺活动的全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阶级、阶层、利益、战争等诸多问题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产生了,有了这种复杂的、政治性的实践,文艺尽管仍然存在,但从此并不“单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文艺始终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的情感宣泄,不再简单地与劳动相关,而是与社会生活相关。

当然,美是文艺生而有之的属性,离开了美就不能称其为文艺。一方面,中

国的文艺离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审美理想,脱离了这一点,文艺就失去了本性。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唱主角的文艺都是密切关系人的命运、时代的风云的文艺。我们所读过的《十日谈》《怎么办》《青年近卫军》《子夜》《阿Q正传》等世界名著,都是充分“入世”并有着深远社会影响的文艺杰作。世界文艺史证明,文艺具有两种功能:审美的功能与社会的功能,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是在能见到的人类社会历史中长存的。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 20 世纪的文艺活动史,它既是一部产生过《阿Q正传》、《黄河大合唱》等巨作的可以与世界顶级艺术相媲美的艺术史,更是一部掺杂了血与泪的战争史,它更重要的使命是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这是无法回避的中国 20 世纪文艺的历史性命运。

文艺参与了社会改造与政治运动,这是中国 20 世纪文艺活动史的一大特点。它在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真正成为战斗的“匕首与机关枪”,以至于文艺家屡屡被卷入政治漩涡,或被枪杀,如“左联”五烈士,或被“坐牢”,或被政治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或被“运动”打入十八层地狱,这都是这个世纪文艺活动与政治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铁证。

与 20 世纪中国革命文艺活动息息相关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及其对文艺活动的深刻影响。关于这一点,此套书有详细的描述与论证。而我在总序中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不是铁板一块,一百年不变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曲折发展、逐步成熟、历经反复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来讲,并不是一个天然可以拿来使用的武器,它有一个被逐步中国化的历史演化过程。从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来自 19 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 20 世纪中国的文化碰撞是有一个相异、相斥、相融的客观历史过程的,其间不乏激情与畅想,但更多的是沉重的思考与试验。纵观百年历史,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有着复杂的变化和发展的,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曲折的。这与任何外来思潮在中国落地后的命运是一样的。

作为西方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 20 世纪的中国独领风骚,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研究课题,应当另文阐述。但为什么在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能为主流政治力量奉为宗旨并践行不息,内中定有缘由。科学、实事求是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这是 21 世纪的

我们的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起,它就被本土化和“被改造”了,诞生于欧洲文化土壤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对最初的中国革命者来讲,是解放的武器和改造社会的工具,因此,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诸多文化因素中,中国的革命者最先选择了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这一民族革命、民族解放的目标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完全可以被后人理解的。

然而,20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比我们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原初设想的要复杂、曲折得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育发展,其曲折的过程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料想不及的。在种种危害性的倾向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苏俄经验的倾向,它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其惨烈的损失和付出了血的代价。教条主义倾向也反映在文艺活动中。正如本书所披露的那样,“左联”时期的革命文艺家组织中出现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倾向,不顾中国国情一味要求“无产阶级斗争”的倾向,不讲艺术性只讲政治需要的倾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革命文艺活动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左”倾政治路线曾经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文革”十年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全民的文艺活动被扭曲成为“八个样板戏”和三突出的“高大全”形象,使得20世纪中国革命文艺活动被抹上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笔。

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能留下辉煌的一笔,内中主要原因是它坚持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核心价值”。“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根本宗旨,同时又是行动的指南。尽管20世纪政治风云诡谲,变化多端,但共产党人坚持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大原则,总能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并逐步赢得胜利。

从文艺活动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中国20世纪文艺活动,是积极入世的,干预生活的,引导精神发育的,而不是躲在“小我”的精神世界中自我陶醉的、无病呻吟的。所以,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相融在一起的组成部分,这是已经翻过一页的20世纪的中国文艺活动史的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重温和再写20世纪中国文艺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历史,是重温和再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一次义无反顾的选择:为民族解放和人的解放而战的动人心魄的历程。

1978年启动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20世纪的中国文艺活动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又更为复杂的历史时刻。较之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历史进程,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搞社会主义是一项更为复杂的事业。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处在更加复杂微妙的历史关系之中,这一段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每一个关注马克思主义命运的人们高度重视。

在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文艺活动还有没有作用?还能不能起指导作用?这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风潮涌动》描述了新时期文艺运动的发展因素,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文艺活动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然而,这仅仅是一场伟大历史实验的开始,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远远没有暴露出来并得到深入的、有说服力的论证。

就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活动而言,在和平发展条件下的当代中国面临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尖锐挑战。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个人”“自由”“利益”“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与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矛盾吗?如果这两者是可相融的,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就有可能重新建立起来,并付诸新的实践。

经历了 30 多年的改革实践,当前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话题在中国理论界被再三提了出来,这是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命运的一个新的尝试和必要的选择。

在战争年代为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战的中国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性质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又如何与“市场的社会主义”建立必然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是发自运动内部的和出自历史深处的?这样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化运动的发展格局。棘手问题的求解途径在于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内部天然包含的继承了欧洲人道主义内涵的元素,并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解放”的价值回归到它本来的位置上。在这一点上,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前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的指导下成熟起来,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文化发展所获得的崭新的精神环境和历史氛围,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可能的新的出发点。当然,这个新的开局将是困难和充满未知数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不能顺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在中国如果不能为了“人的解放”而作出辩护,还有什么必然存在的意义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在 21 世纪的中国文艺活

动中,必然获得重生,它的“为了人”的社会性总体关怀是不可磨灭的,是与人类历史的健康发展永恒相伴的。

是为序。



2017 年夏

绪论 新生与巨变

1949年至1966年是20世纪中国发展史上特殊的一段时期,常被称为“新中国十七年”。因而,“十七年文艺活动”就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1949—1966)这一阶段的中国文艺活动。历史决定了这一时期特殊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而且开启了一个新的文艺时代。

在此,我们以新中国十七年的文艺活动为研究对象,力求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对新中国文艺活动的历史形态、结构体系、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梳理、反思和论析,以探索或厘清其历史必然性、历史合理性以及历史局限性。

对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历史作出完整准确的定义,无疑是困难的,特别是对于“新中国文艺十七年”这样的定义,就很难找出一个恰当的词语,能对那段悲壮而难忘的岁月,作出确切的描摹。十七年时期就像一首不断进行的交响曲,它既有雄浑壮烈的乐章,又有低婉柔情的曲调,也有不和谐杂音的鼓噪,更有那衷情哀婉的悲歌……这是历史所谱写并留给后人的抹不去的记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就曾有人写下这样风雷激荡的诗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多少年代/多少中国人民/在长长的黑暗的夜晚一样的苦难里/梦想着你/在涂满了血的荆棘的道路上/寻找着你/在监狱中或者在战场上/为你献出他们的生命的时候/呼喊着你……”(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正如毛泽东那一声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

起来了”。这十七年,开篇是如此壮阔,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改写了历史,告别了禁锢和黑暗,迎来了自由与光明。可以说,1949 年成了新旧两个世界的分水岭,它标志着新中国的发端和崛起,其语义已远远超过了“伟大”本身。灾难性的痛苦已经过去,一个全新的国度,向全世界展开了她的风貌。一个曾身负重荷的民族亦艰难地启程,继而轻盈地起跳。

每一个时代,都有迥异于其他时代的传奇与语汇,它们是填充整个十七年文学艺术的血肉。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力图把最坚实、最有力的部分呈现出来,这既来自于理智上的权衡,也来自于对过去那段岁月的敬畏和沉思。沿着历史的流脉,去追溯、寻觅十七年所留给我们的文艺轨迹,构筑起共有的记忆城堡和精神家园。

一、新历史语境下文艺活动的巨变

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自主,终于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这一天实现了,中国数亿人的命运近百年来第一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政治上的重新统一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巨变。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2 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会议。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下午 3 时,北京 30 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

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天成立了!”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毛泽东宣读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新的历史纪元的开始,使人们感受到连绵战火之后自由与独立的可贵,流露出激越的感激之情。艺术家们写下了一首首颂扬新中国的诗篇,如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冯至的《我的感谢》,以及艾青、臧克家等许多诗人创作的充满激越感情的诗作。在《新华颂》中,郭沫若写道:“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艾青的“礼炮震动着整个地壳,全世界都庆贺新中国的诞生”,石方禹的“祖国,我因你的名字满身光彩”等诗句,都生动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普遍的感受和心情。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遭受了无比的欺凌和盘剥。然而中国人从未停止抗争的脚步,在失败和屈辱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国家发展的方向。中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个选择经过了严酷的历史实践的检验。



▲ 郭沫若



▲ 冯至



▲ 何其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空前统一,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确立了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事件。这个伟大事件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必然带来一场深刻的文化上的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在文化上需要创建一个新型的模式以适应新的历史时代。应该说十七年的文艺活动,试图建立的是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文艺。这种文艺确保的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它最终的旨归是配合社会主义建设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很显然,这样的新型文艺必然需要一个建构的过程。十七年的文艺活动是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共同参与建构的产物,其

中国家意识形态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文化出版和文化教育也参与了这种文艺活动的创造,形成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独特范式,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十七年文艺活动的思想理论基础。

新中国文艺的发展进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同步。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领》,纲领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清除腐朽没落的旧文化,借鉴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创造适应新时代群众需要的新文化,为文化事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领域重新出现了统一的局面,这大统一的局面要求有统一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正是这一需求成为十七年最重要的文化表征。一个统一的政权的建立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观念,当然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观念下衍生的文化精神既有它的积极因素,也有它的消极因素。所以说十七年文艺活动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带有强化的革命文化精神之中呈现出来的。

就文化活动主体而言,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实现了多少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整个文化社会心理情绪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强化,新文化建立的欲望超过了对政治统治的逃避情绪,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感和欲望在传统“文道”观的思维模式引导下重新融合协调起来。文化活动一体化特征和政治上的大一统互为表里、并行不悖地建立起来了。统一的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成为文人作家进行文化活动的最终的检验标准。文人的个体情感最终要服从于工农兵群体情感,传统思维中的群体思维的价值取向造成中国文人善于从群体角度来为个体价值定位的习惯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又暴露出来了。晚清以来所批判的传统的群体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定的复归,“五四”以来张扬个性的价值取向逐渐在民族整体理性的制约下有所削弱。^①

首先,表现为文化结构的调整及重新组合。新中国的建立带来文化语境的变化,开辟新的文化时代需要汇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力量,文化语境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整合。国统区和解放区、自由和保守、党内知识分子和民主知识分

^①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92页。

子都要被纳入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中来。这是不同文化板块的整合,新时代要求此前的多元性文化都要被整合到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中来。苏联学者B. 凯列曾经指出:“文化……是由当今时代的性质,它的现实的、理论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所决定的。”十七年时期不同文化板块整合的内在动力还是国家社会政治力量,并且这种统一的社会政治变革对文化产生的是一种巨大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以延安战时文化为基础,吸纳整合其他文化的整体态势。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开幕。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两支文化队伍第一次实现了胜利会师,并走向合流,以前处在文化中心的自由主义式的城市文化工作者迅速被边缘化,等待改造。文化的中心主要还是来自于解放区的战时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文坛。担任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领导职务的理论家和作家主要来自于解放区。

其次,新的文化制度开始逐步建立。文联和作协成为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职能部门。文化的生产出版、传播、接受机制都依附于强大的国家政治体制中。在这种新建立起来的文化机制之中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对政治的依附性,只能是接受和认同新的文化制度。

再次,不同文化板块的整合还表现在新的文艺价值标准的统一上。新的革命文化的原则和标准主要来自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新的革命文化确立了文学艺术必须服从于党的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原则。文学艺术标准的统一预示着新的革命文化的统一。^①

新中国的成立是一次历史的革命转折,也是当代文化的一次革命转型。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带来了历史的伟大转折,也带来了中国文化的一次变革。新中国的诞生使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由衷地产生了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和自豪感。在这种时代情绪的影响下,颂扬新中国、颂扬英雄、颂扬劳动等成为基本的主题。一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在解放战争炮火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成了这种革命文化的主体。而一大批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正像何其芳当年所说的那样,唱惯了夜歌的喉咙还不习惯唱白

① 参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天的歌,他们的审美思维方式面临着一次痛苦的转变。^①

当我们重新对中国 20 世纪革命文艺活动作历史的审视与评价时,应采取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去对它作客观的、具体的分析。既看到它超越于前人的地方,也不忽视它所存在的局限和问题,不轻易予以全盘肯定,更不轻易予以全盘否定。有些学者指出这次中国文化的转型,是在特定的战争文化定势下的一次文化转型,在这样的革命文化背景下,使十七年革命文艺活动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具有战争文化的特点。来自解放区的艺术家和新成长的敏锐艺术家得时代风气之先,他们以新的世界观透视自己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以共产主义的理想点燃创作的激情,回顾革命的历史,描绘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塑造新时代的英雄和工农兵形象,建构了我国 20 世纪革命文艺的颂歌和战歌时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非常崇拜,人们都怀着极大的革命激情,积极向上,思想也非常单纯。这种社会风尚和文化精神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这一阶段的文化活动及文学艺术创作的主题大约有三个,即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和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因此,这个时候的艺术作品带有明显的文以载道的特点,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但是十七年文学所蕴含的精神,却也让人难忘。对此,有的学者这样来评价十七年文学:十七年文学比后来的“伤痕文学”要从容、平静、丰富,比“今天文学”要高尚、积极,因为“今天文学”很多是“床上文学”“赚钱文学”“没落文学”。^②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和革命文化模式。十七年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方针是毛泽东提出的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强调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文艺以革命标准代替艺术标准,强调文艺的战斗性,甚至为了捍卫理想的纯洁性,反对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交流,使自己的文化体系封闭起来。当然,文艺属于上层建筑,具有意识形态特性,新文化革命的建设当然要与政治取向相适应。但是

①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92 页。

② 参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2 页。

如果将一般的休闲文化、娱乐文化、餐饮文化等都贴上“革命与政治”的标签,则无疑是不妥的,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的封闭意识必然影响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也势必带来文艺上的萧条。由于过于强调文艺的政治化,当时出现了很多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作品,而文艺的真实性、艺术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当然十七年也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优秀作品,不能一概而论。

二、十七年中国文艺活动的历程

综观新中国十七年文艺活动的历程,它大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贯彻大会精神,投入到新生活的激流中,奔赴工厂、农村、部队和抗美援朝前线,描绘新时代,歌颂新人物,掀起了一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潮和创作热潮。文艺工作者思维方式的调整 and 思想感情的改造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与政治对文艺的要求不相适应。为了加快这种调整和改造,推行了某些强制的方式,50年代前期,文化界掀起了三次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1951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5年)。这三次批判运动突破了文艺的界限,转化为全国性的政治批判。其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升格为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后又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文艺界、科学界人士,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这一方针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双百”方针的具体内涵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

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文化界的现实主义理论和批评十分活跃,使现实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6月1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社论

主义精神一度高扬。一批文艺理论家结合创作实践,勇敢地批评了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出现了“干预生活”和“人道主义”两股彼此呼应的文艺思潮。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文艺活动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出现了文学刊物的改版,戏剧的革新与解禁等局面,在文艺创作上出现了一批大胆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的作品,也出现了表现“个人主义”的创作。“双百”方针是一项繁荣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它的推行为我国文艺界培育了一批人才,留下了一些十分可贵的理论成果和文艺作品。

正当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初步出现了文艺的活跃局面之时,从1957年下半年起,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政治领域的反右斗争,波及文艺领域,开始于1957年6月。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等,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先后把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打成“右派分子”,展开批判斗争。把贯彻“双百”方针而出现的一些作品和文艺观点,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纲领”。《文艺报》甚至在1958年第2期特辟“再批判”专栏,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编者按语,重新发表王实味等写于延安时期的作品,进行再批判,以追溯所谓“右”的、“修正主义”的历史根源。与此同时,文艺

组织、文艺刊物也遭受重创。这场斗争已被历史证明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①反右斗争主要批判三种文艺界人士:一是一批老作家,如丁玲、冯雪峰、陈企霞、艾青、吴祖光等;二是文坛新秀,如王蒙、刘绍棠、从维熙、方之、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等;三是其他一大批有右倾嫌疑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反右斗争断送了贯彻“双百”方针的结果,助长了“左”倾文艺思潮的泛滥,使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学术思想和文艺批评有了更广阔的市场;这场斗争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造成当代文学的巨大损失,这些文艺工作者从此忍辱负重,销声匿迹,长期不能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贡献。

60年代初期,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艺界也开始实行文艺政策的调整,甄别平反曾经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等。1961年第3期《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的专论,指出对于近来一个时期题材问题上的片面化、狭隘化的倾向,不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必须广开文路,提倡题材的多样化,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在这一背景下,文艺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文艺政策作出调整。这期间举行了四个有代表性的会议:新侨会议,即1961年6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广州会议,即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大连会议,即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文艺政策的调整,对纠正“左”倾思潮,恢复革命现实主义,起了积极作用。它局部地调动了一些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给文艺带来了生机。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②。这一断言使得文艺界已经存在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李建彤的《刘志丹》被康生指责为“为高岗翻案的大毒草”。第二年又宣称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使近万人遭到株连。此后,

^①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②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